

一 东夷叙说

——从蛮荒走向文明

几十万年以前，在现今山东中部泰沂山脉的中段高峰鲁山之阳，在沂河上源连绵不断的山岭和层层密布的丛林中，活动着一群既不知个体数量、也不知从何处迁来或原本就是土生土长的“猿人”。他们白天依山而猎，傍河而渔，又成群结队地游走采集；夜晚不分男女老幼，同在充分发育的石灰岩溶洞中群居。虽然从人类自身发展的程序上看，他们早已告别动物界而成为“真正”的人，并且相距劳动创造“文化”的零点也已极其遥远，但仍旧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最简单、最原始的自然生存方式，在漫长的进化旅途上艰难地跋涉……

这些“猿人”——考古学者称之为“沂源猿人”——纯就活动地域而言，可称是现在所知最早的“东夷人”。

考古表明，泰沂山区是中华先民及其文化最早的

发祥地之一。不过至迟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海岱地区古人类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殖，即逐渐由地势较高的山岭地带移民浅山、丘陵、谷地与沿河平原。迄今所发现的本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和地点，绝大多数集中在泰沂山脉以南的沂河与沭河上、中游地区，只有零星的地点散布于渤海湾南岸与黄海沿岸。粗大的打制石器日趋小型化，类型特征日见鲜明，制作和修理技术也趋向成熟，这些都显示出旧石器文化的进步。群体生活的游走状态依然持续下来，而如新泰“乌珠台人”的遗骨所显示的那样，还在距今三万年以前，海岱先民在体形、体貌和体质上的人种特征已接近现代人，后来的变化只不过表现出局部的细微差别。

大约在距今三万年到一万年之间，沂、沭河流域以及鲁中南的汶、泗流域出现成群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其时与粗大石器并存的大量细小石器，反映出海岱先民的游牧和畜牧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农耕文化的萌芽，居民的经济生活开始向新石器时代以农耕和畜牧为主的形态过渡。简易的窝棚可避风雨，缝制的兽皮常为衣着。社会组织结构也随之变动，估计这一阶段已出现了按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母系氏族及简单的氏族制度，并已形成一些散处的聚落，其中个别较发展的聚落可能已具备部落的雏形。

人类历史在步履蹒跚地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以

后，终于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进入了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了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的新阶段。中国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时间有先有后，海岱地区是最先进入这一时代的地区之一。目前考古已确定的本地区新石器文化以后李文化为最早，但它还不是新石器文化的初始形态，本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胚胎大约在沂沭、汶泗细石器文化的末段已经形成。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十年间海岱考古事业的突飞猛进和长足发展，已然建立起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完整谱系，这一谱系同时也为系统地研究史前期东夷古史和东夷文化提供了极可信赖的参考框架。大体地说，后李文化的上限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 6500 年以前，而自公元前 5300 年前后转入北辛文化。后李文化的遗址，至今发现尚少，且仅限于鲁北济南到潍坊一带；北辛文化历时千年左右，地方类型增多，有关遗址逐步扩展到鲁中南、苏北及胶东地区，且出现整合的趋势。继起的大汶口文化，自公元前 4300 年前后直到公元前 2600 年前后，持续近 20 个世纪，学者公认是东夷文化史上的一个光辉发展阶段。其遗址遍布今山东全境及豫东、皖北、苏北地区，各地方类型联系密切，而不断出土的许多高品位文化成果，尤其是精致的陶制、玉制礼器系列及精美的骨雕、牙雕艺术品等，都显示出大汶口文化的整体发展水平居于当时华夏全域

的领先地位，其晚期发展势头更超过中原仰韶文化。此后五六百年间，海岱龙山文化全面继承大汶口文化而逐时新变，文明的因素大见茁长，其末段已延入传说的夏代纪年范围。

历史学上的“东夷”概念，本为上古海岱居民的总称，是与“西夏”（中原居民）、“北狄”（北方游牧部族）、“南蛮”（南方游耕部族）相对而言的。其族名用字，在现存古文字史料中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初写作“尸”，原是对古夷人踞坐（跪坐）习俗的摹写，直到西周春秋之际才代以“夷”字。不过夏代已有“九夷”的俗称，多用以泛指泰山以东的夷人部落或小方国，可见中原居民很早就已指称黄河流域东部地区的居民为“夷”，东夷的历史自可上溯到夏代以前。联系考古言之，东夷古史传说的事实素地亦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乃至更早，但作为地域文化共同体式的东夷族的形成及其传说历史，依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还只能大致定位于考古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即约为公元前 3500 年到公元前 2600 年间的时段）。这与世界各民族神话传说的起源时间亦大体一致。在这一历史区间之内，中华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氏族和部落逐步凝聚为不同层次的部落集团，并从中孕育出更高层次的“东夷”、“西夏”、“北狄”、“南蛮”四大集群。下至传说的“五帝”时代（大体年代约相当于考古的龙山文化时期），各大集群逐鹿中原，通过大规

模的部落战争和不间断的部族、地域文化交流而走向融合，遂以中原部落大联盟的建立和发展为枢纽，开出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进入滥觞期的历史新局，文明社会的曙光因此粲然可观。考察东夷古史，亦须以史前中国社会变动的历史行程为基本线索。

现在呈奉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意欲清理和选择相关的神话与传说史料，以展示东夷古史与古文化的概略状貌。由于我国所有现存的神话与传说史料都是片断的不系统的，因此这本小册子的“故事”性叙述不得不做些综合，虽亦时时以考古成果相参照，而都不可能详证。其间传说史料与考古史料的错位与紧张不可避免，然考古重要而非万能，传说迷离而非无真实，要在恰当地撮合而不失历史诠释的情理。史前史的叙述绝不能仅是静态的考古史料的集合，真欲重建中国古史，使之呈现出生龙活虎的动态历史感，现有的神话与传说史料仍是亟须大力开发的园地。

东夷文化源远流长，其历史影响直接贯通商、周文化，两周时期的齐鲁文化仍是其嫡传。这里的片断撷取侧重于史前，对于它后来的持续发展则只不过约略提及，相关的“故事”尚有待今后的梳理。

二 日出阳谷

—— 古夷人的太阳崇拜

太阳或太阳神崇拜——或者放开一点说——包括日月星辰等在内的天体崇拜，以至包括风、雨、雷、电、水、火等一切自然现象在内的自然崇拜，几乎和动植物图腾崇拜的古老风俗一样，曾经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原始部族中。原始人类从季节变化及自身生产、生活的经验观察中早就意识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都与太阳的运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祖居海岱地区的东夷集群，由于背依大陆、面向海洋的自然地理环境，还在厥初自身文化的发轫期，也已经洋溢着浓烈的太阳文化意识，与太阳崇拜结下了不解之缘。

先秦奇书《山海经》记载，在东海之外的大荒之中有一座山（实指海岛），山名叫孽摇颡羝；山中有个大壑叫温源谷，人称汤谷；汤谷上生长着一株硕大无朋的太阳神树——扶桑，又叫扶木、搏桑、搏木或


若木、建木。自古相传普照万物的太阳有 10 个，它们都由一种叫作阳乌的三足鸟背负着，一个接一个地在汤谷中沐浴、在扶桑树上歇息，每当下一个太阳来到这里，前一个太阳就从树上出发，这样太阳就永无休止地连续运行。也有 10 个太阳一同栖息在扶桑树上的美妙图景，这时一个太阳高居扶桑的上枝，其余九个太阳分居扶桑的下枝。据说每当太阳登上扶桑将要出发的时候，也就是神州大地天将放亮的时辰。

神话文献中的汤谷，也写作暘谷、阳谷，显然是古人所设想的神秘而又光辉的太阳升起的地方。其地在海东极表，虽人迹不至而可遥望，人间的昼夜晦明就从这里开始。《神异经》所谓“扶桑山上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潮水应之”，仍是由扶桑传说延伸出来的海日神话。类似的神话或称扶桑之树的顶端有天鸡，每至子夜而天鸡鸣，天鸡鸣则日中阳乌应之，阳乌鸣则天下之鸡皆鸣。扶桑之树的神话形态，《山海经》中一说它“柱三百里，其叶如芥”；一说它叶子是青色的，树干是紫色的，开出的花是黑色的，结出的果实是黄色的，果实像麻籽，叶子像芒草，树干则高达百仞，有干无枝，顶部盘旋九曲而上参云天，根部亦九曲盘旋而下通九泉。古小说《玄中记》所谓“天下之高者，有扶桑无枝木焉，上至于天，盘蜿而下屈，通三泉”即指《山海经》中的后一种描述。《十洲记》

保存有另一种说法：其树高数千丈，大二千余围，因两两同根偶生，互相扶持，故称扶桑；其叶子和果实亦如中原的桑叶和桑葚，只不过叶子是红色的，果实极为稀少，九千年才结出一次。《拾遗记》又谓扶桑“直上千寻，叶红椹紫，万岁一实，食之后天而老”。《神异经》则又具体指称扶桑之树高八十丈，叶长一丈、宽六尺，椹长三尺五寸。由此而渐失扶桑神话的原始状貌。

扶桑传说的起源，有着久远的地域文化背景，反映出东夷文化深层结构的心理基础。

传说中的东夷集群，最早以太昊、少昊为总代表。一般认为，太昊、少昊即大昊、小昊，实是东夷集群先后兴起的两大集团的代称。作为东夷总名的“昊”字，古籍大都写作“皞”，或又写作“皓”、“浩”、“暉”等。“昊”即“昊天”，指太阳高照而广袤无边的天；“皞”、“皓”等字，或表示洁白，或表示盛大，均取义于“日出貌”，即晨曦初生的写照。考古学者注意到，还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阶段（约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3500年间），海岱地区彩陶纹样母题中多见的圆点和圆圈，已经透露出清醒的太阳文化意识；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约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就曾盛行于海岱各地的大镂孔豆（一种形似高脚盘的陶制食器），其镂孔装饰中的标准圆形也被视为太阳或星体的模拟；下至大汶口文

化晚期（约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600 年间），见于彩陶器物表面的黑白同心圆及红色大圆点等圆形，更一向被认为是典型的太阳纹饰。古夷人以象征太阳文化的“皞”或“昊”字为族群集团的名号，当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海岱居民的太阳崇拜习俗；甚至有人认为，大汶口文化晚期流行颇广的一例极具典型性的陶器符号——，即是“昊”字的祖型。现在多数学者承认，所谓“太昊”、“少昊”犹言大太阳神或小太阳神，而在部族标称的意义上，它们同时也代表古夷人的祖先神及各自集团的实体和首领。

作为文化现象来看，太昊、少昊之名的缘起是与阳谷和扶桑的传说息息相关的。《山海经》谓建木在大水环绕的“九丘”之地，太昊曾以为交通天神的阶梯，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扶桑神话；而同书又谓“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其地望尤与原初的扶桑神话相合。神话中的扶桑是与太阳和太阳神鸟三位一体的，实质上是东夷先民大地崇拜、太阳崇拜与鸟图腾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学者多以为扶桑的原型就是古夷人祭祀“圣地”的社树。“扶桑”之名大约可以直译为“凤桑”；“凤”，“扶”一声之转，而凤为东夷最高图腾（详见下节）。不过这个“桑”字，原仅指大树而言，并非是特指后世用以养蚕的桑树。扶桑又称若木，“若”、“木”二字合文即成“桑”字，此“桑”字上部实为“若”字之变

体。“若”字初文像巫师祭风（凤）之状，故“若木”即“扶桑”，在传说中遂转而为部族祭祀“圣地”的神树。古部族特重祭祀，大凡公祀活动场所即有社祠，并各以其地所宜栽植的大树为社祠标志。这一风俗集中指向部族文化共同体的大规模祭祀活动，其活动中心久而演化为集群“圣地”，从而产生出面貌各异而又趋向同一的扶桑传说。

先秦古籍多以扶桑为地名，或又写作穷桑、空桑，皆为一名、一事之分化。古今学者大都指认其地本在传说的“少昊之墟”，即今山东西南部的曲阜一带，今曲阜城东尚有古迹少昊陵。联系传说和考古来看，这一带曾先后长期为太昊、少昊集团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因而也就是东夷“圣地”之所在，故有古史专家称之为上古时代东部平原区的第一政治和文化中心。后来随着太阳文化的散射，各大集群都向往着东方，扶桑的地望遂逐渐被推向东海以至太平洋。隋唐以后诗文资料中的“扶桑国”，今人考证或以为指日本，或以为指墨西哥，或又力证它只是“东方的幻想国”。神话的变异不免渺茫难稽，而由恍惚的记忆尚可推见扶桑原型的痕迹和影像。

太阳文化在上古华夏之域的传播是全方位的，不限于东夷地区，代表西北集群的炎帝、黄帝名号也都起于太阳崇拜。《说文》云：“炎，火光上也。从重火。”古文“光”字也有写作“炎”、“光”二字合文

的，突出的是炽盛的火光，也就是火气盛阳之色。

“黄”字，古文也从“光”，本义指日之光明，与“日”、“光”合文的“晃”字同义。由炎帝、黄帝名号可知，西北集群的居民也都毫不怀疑地相信自己是太阳的子孙，并且都有着各自的太阳崇拜系统。但从文化心理的比较上观察，东夷集群的太阳文化意识无疑最为强烈，这是追述东夷传说古史首先要关注的重大特征之一。后来可靠的文献记录，从商代甲骨文中的日出、日入之祭，直到周、秦时代齐地八神祠中的日主、月主、阳主、阴主、四时主之祭，仍然深切显明地印证着古夷人太阳崇拜的悠久传统。《史记·封禅书》说，八神祠“绝莫知起时”，或曰“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其中日主祠在成山头，成山头“人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相传这里曾有“不夜城”，因为有太阳在夜间升起，故名“不夜”当是古人迎祭日出的场所。最为特出的行为事例，莫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又“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以致为回归太阳文化精神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后面我们还将谈到，秦王室的祖先原出于东夷。

三 群燕纷飞

——古夷人的鸟图腾崇拜

东夷文化的另一个显著区别于其他集群文化的重大特征是鸟图腾崇拜。这方面最完整、最系统的传说史料是有关少昊集团“鸟官”机构的记录。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 525 年，郯国的君主——时称郯子——到鲁国访问，鲁国贵族叔孙昭子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听说少昊氏都用鸟名作官称，这是什么缘故呢？”郯子回答说：“少昊是我们国家的老祖宗，我知道这其中的缘故。古时候黄帝以云纪事，所以用云名作官称而称为云师；炎帝以火纪事，所以用火名作官称而称为火师；共工以水纪事，所以用水名作官称而称为水师；太昊以龙纪事，所以用龙名作官称而称为龙师；我们的老祖宗少昊即位的时候，恰好有凤鸟飞来，所以就以鸟纪事，用鸟名作官称而称为鸟师。”所谓“云师”、“火师”、“水师”、“龙师”、“鸟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

“云官”“火官”“水官”“龙官”，“鸟官”，因为古人官、师不分，所以官也称师。少昊的“鸟官”机构，照郟子所说，共由 4 个类别的 24 种“鸟”组成：

其一是历法官。这一类有“五鸟”，为首的是凤鸟氏（凤鸟族），职务是掌管历法的历正。在凤鸟氏之下，玄鸟氏（燕子族）为司分，掌管春分和秋分；伯赵氏（杜鹃族）为司至，掌管夏至和冬至；青鸟氏（黑枕黄鹂或鹳鹑族）为司启，掌管立春和立夏；丹鸟氏（锦鸡族）为司闭，掌管立秋和立冬。

其二是执政官。这一类有“五鸟”，都以猛禽为名。包括：祝鸠氏（鹁鸠族）为司徒，掌管土地与政教；鸛鸠氏（鱼鹰族）为司马，掌管军事；鸛鸠氏（鸱鸢族）为司空，掌管手工业；鷩鸠氏（鷩鹰族）为司寇，掌管司法；鹵鸠氏（鹵雕族）为司事，掌管部落日常事务。

其三是手工业官。这一类有“五雉”，都以野鸡为名，包括鹑雉氏、鹑雉氏、翟雉氏、鷩雉氏、翟雉氏，分别为木工正、陶工正、金工正、皮工正、染工正。

其四是农官。这一类有“九扈”，包括九种候鸟，名称古怪，分别负责督促民众耕种、耘苗、收获、储藏、为果树驱鸟、为农作物驱鸟、为庄稼驱兽、为蚕驱雀及适时麦收。（“五雉”和“九扈”的具体名称和

分工，郟子的原话没有指出来，这里是根据后人的注释补记的。)

郟子还说自颛顼为“帝”之后不能用传统的方法纪事而改用新起的方法从此便有了民事官称。

这位郟国君主所讲述的古代部落“官制”，当时已没有人能搞得清，因此连博学的孔子在听说其事，也“见于郟子而学之”，又不禁有“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叹，意思是自从官府的学术衰落之后，好多学问就只在民间流传和保存了。实在说，对于这种制度的来龙去脉，恐怕连郟子本人也未必能够说个明白。和其他传说一样，这个传说也不免有后人添加的成分（如有关节气的完整观念和司徒、司马等官称），但话里的文章极有历史意义，其内核部分还是可信的。现在从图腾文化的角度来审查，郟子的话实际道出了上古少昊集团的部落组织结构。如果权且把这当作一个部落来看待，那么这个部落共有“五鸟”、“九鸠”、“五雉”、“九扈”4个胞族，胞族之下又分为24个氏族，这些氏族都以各自所崇奉的鸟图腾为名称，从而构成“鸟官”的系统。按照原始社会末期的习惯法，部落内部的各氏族在原则上是平等的，每个氏族以酋长为代表行使部落的一种权力，氏族名称也就成为体现这一权力的“官职”名称。这一系统，如果把它看成是东夷部落组织的一般模式，是可以作多层次的放大的。比如在某一层次上，把少昊集团视

为有限地域范围内的一个部落群，那么它的基层就以部落为单位，这些部落又组成四五个甚至更多的小部落群。这样，整个少昊集团就可以构成五个层次：氏族——胞族——部落——部落群——部落群集团（少昊联盟）。当少昊集团极盛之时，这一构成是有可能实现的，考古所见大汶口文化的不同层级的聚落遗址和聚落群也可为此提供比较的证据。

这里要强调的是，少昊集团的“鸟官”系统形象地反映出，东夷族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百鸟”共同体。尽管这种图腾的机制也有显隐兴衰乃至混同或改变，而它所体现的特殊风俗和文化精神却在许多东夷部族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仍被长久地保留下来。著名的例子则有商人、秦人及满族、朝鲜族等部族的“鸟生”始祖传说。

商部族原为东夷族的一支。《诗经·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一神话的简要文本见于《史记·殷本纪》商人的祖先名契，他的母亲叫简狄，是有娥氏的女儿，为帝喾的妃子；当简狄和诸妃一起洗澡的时候，见到有燕子遗下一只卵，就拿来吞下去了，结果怀孕而生下契。《吕氏春秋·音初》篇则记有另一种传说：有娥氏之女两姐妹同为帝喾的妃子，帝喾为她们建造了高台宫室，她们饮食的时候都要鸣鼓。帝喾令燕子前往探视，燕子叫起来是一种“嗞嗞”的声音。二女喜欢燕子，争着去捕捉它，把它扣

在了一只玉筐里。不一会，掀开筐子去看，燕子遗下两只卵向北飞走了，遂不再回来。《楚辞·天问》中问道：“简狄在台馆中，帝尝做了些什么呢？燕子送来了它的卵，简狄怎么就有喜了呢？”问的就是这故事。传世商代青铜器物上有“玄鸟妇”三字铭文，为商人的燕图腾感生神话提供了实物证据。近世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也发现了一些商人崇拜鸟图腾的材料。如商王室先公王亥之名，有时就写成“亥”和“隹”的合文，“隹”就是鸟。《山海经》中有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的记录，与甲骨文中的有关材料相合。甲骨文中还有“商”和“鸟”的合文，为星名。

秦人祖先的图腾感生神话与商人同出一辙。《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的女性始祖叫女脩，是颛顼帝的后裔。女脩在织布的时候，有燕子遗其卵，女脩吞下，就怀孕生下了大业。大业娶少典氏的女儿，名叫女华，生大费。大费协助禹治水有功，帝舜赐之以姚姓之女，又使他掌管畜牧业，并赐姓嬴氏，号伯益。这个传说的世系有点乱，但反映秦王族的主支源出于东夷是没有疑问的。他们更早祖居今山东境内，到夏末商初才随商汤征战而迁居到渭水流域。

我国东北地区原是古夷人的主要散居地区之一，这里保存鸟图腾崇拜的习俗最为长久。《满洲实录》说满族祖先是由神鹊衔一红果，有女子吞食有孕而生的；《好太王碑》则记高句丽祖先“出自北夫余，天

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而生”（详见《魏书·高句丽传》）；《后汉书·东夷传》又记夫余国祖先为北夷索离国王的一个侍婢吞下一“大如鸡子”的气团而孕生。有趣的是，近世鄂温克人还把动物图腾叫作“嘎勒布勒”，即根子、起源的意思。他们的各个氏族都以不同的鸟为图腾，和传说的少昊氏的部落结构很相似。西伯利亚东部的土著居民也曾盛行鸟生传说和鸟图腾崇拜。

关于少昊氏的起源，《拾遗记》载有一则美丽的神话：少昊的母亲叫皇娥，夜里在璇宫中织布，白天就乘木筏出游于西海。经过穷桑之地的苍茫之浦，遇到一位容貌绝俗的神童，据说是白帝之子，是太白金星的精魄下凡的。帝子与皇娥在水边嬉戏，奏出动听的音乐，乐而忘返。二人又泛舟海上，用桂树枝作华表，结薰茅为旗帜，刻玉石为鸠鸟，置于华表的顶端，以知四时物候。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氏，又称桑丘氏。这则晚出的神话自然不可证实，但与扶桑说联系在一起，仍非无根之谈。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桂枝表的记录，据研究，这就是古代的鸟图腾柱。这一习俗在出土文物中也得到证实，胶东长岛大黑山遗址就出土有一件夹砂红陶鸟图腾柱，可能是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遗物。最为形象的是浙江绍兴战国墓中出土的一件铜质房屋模型，屋顶立一鸟图腾柱，高七厘米，中空，顶端有一大尾鸠。近世东北地区的满